

Summer 2014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June No.25

2014年6月 第二十五期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第 25 期
2014 年 6 月

主编：郭棲庆 赵宗锋
编辑：王惠英
设计：大达期刊设计公司
E-mail: icwar@bfsu.edu.cn
电话：86-10-88813845
传真：86-10-88813842
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 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100089

出版人

朴仁国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杨学义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理事长

编委会顾问

王恩哥 北京大学校长
陈吉宁 清华大学校长
李 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陈雨露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杨玉良 复旦大学校长
龚 克 南开大学校长
杨学义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理事长
苏志武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
黄泰岩 辽宁大学校长
朴永浩 延边大学校长
林建华 浙江大学校长
Phung Xuan Nha 越南国立大学校长
Pirom Kamol-Ratanaku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校长
Khlot Thyda 柬埔寨皇家学院院长
Soukkongseng Saignaleuth 老挝国立大学校长
Artbazar Galtbayar 蒙古国立大学校长
Tin Tun 缅甸仰光大学校长

编辑委员会

吴志攀 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
李 越 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周云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伊志宏 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光耀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杨 龙 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 莉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
丁俊杰 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
陆杰荣 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强一 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罗卫东 浙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Bouadam Sengkhamkhoutlavong 老挝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Kyaw Naing 缅甸仰光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Prapin Manomaiviboo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Javzan Batkhuu 蒙古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Sum Chhum Bun 柬埔寨皇家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Nguyen Thi Anh Thu 越南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
郭棲庆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兼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副主任
赵宗锋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执行副主任

CONTENTS

目录



P.02

→ 2014 年 5 月 24—26 日，“上海论坛 2014”在上海举行。



P.08

→ 2014 年 4 月 10 日，北京外国语大学承办博鳌亚洲论坛“亚洲文化与企业发展新动力”分论坛。

特稿

- 02 “上海论坛 2014”在上海举行
- 07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召开 2014 年科研资助项目立项评审会

学术活动

- 08 北京外国语大学承办博鳌亚洲论坛“亚洲文化与企业发展新动力”分论坛
- 14 “波兰中国文化研究的重大进展·《卜弥格文集》”出版学术座谈会举行
- 17 “中国文化在亚洲”系列学术讲座（1-4）举行

研究进展

- 21 欧洲早期汉语词典的编纂及出版
- 28 孔子学院在中外人文交流中的作用：以爱尔兰孔子学院为中心

学者与著作

- 34 “亚洲研究丛书·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系列”4 部著作出版发行
- 37 《中国文化在东欧：传播与接受研究》



“上海论坛 2014” 在上海举行

2014年5月24—26日，“上海论坛2014”在上海举行。

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屠光绍，韩国前总理韩升洙，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韩国高等教育财

团事务总长朴仁国，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方军在开幕式上致辞。本次论坛聚焦于“亚洲转型：寻求新动力”，来自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名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复



屠光绍



韩升洙



杨玉良



朴仁国

旦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朱之文主持。

开幕式后，围绕本次论坛主题，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珀森（Adam Posen），剑桥

大学教授、《气候政策》杂志主编迈克尔·格拉布（Michael Grubb），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名誉院长沙祖康分别发表了主旨演讲，围绕世界、亚洲和中国的经济、外交、文化、社会、生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阐释。



方军



朱之文



罗伯特·希勒



亚当·珀森

本届论坛下设九个分论坛，分别是：“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终结？”、“世界经济增长结构的变化与亚洲面临的新挑战”、“金融创新与金融稳定”、“国际大都市发展的政策引导与优化：创新与智慧”、“变化中的亚洲劳

动力市场”、“城市化的生机与城市的未来”、“亚太合作的新视野”、“环境与卫生系统持续发展的创新之路”、“迈向包容性发展：绿色能源转型与环境气候治理”。

本届论坛所设的多场高端对话，重点聚焦



迈克尔·格拉布



沙祖康

“雾霾笼罩下的中国与亚洲——环境安全及科技、政策的应对”、“亚洲经济增长瓶颈，谁能率先突破？”、“转型中的亚洲城市与社会发展”、“社会企业在应对亚洲新挑战中的角色”等热点领域。

5月26日，为期两天半的“上海论坛2014”在复旦大学闭幕。闭幕式举行前，论坛组委会专门组织举办了“自贸区特别专场”，围绕“自贸区成功的关键是什么”议题，邀请世界自贸区协会主席格兰姆·马瑟（Graham Mather），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知名经济学家张军，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校长鲍琳·范德梅尔莫（Pauline Van Der Meer Mohr），香港贸易发展局大中华区研究副总监邱丽萍，韩国海洋水产开发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金范中，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简大年等发表主旨演讲。

闭幕式上，各分论坛进行了关于研讨会议举行情况和主要结论的专题汇报。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

主任朱之文分别致辞。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主持了闭幕式。

本届论坛，共有700余位来自世界各国的政界、商界、学界精英和媒体代表齐聚复旦，围绕论坛主题，共同梳理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亚洲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会议期间，通过分论坛研讨、圆桌会议、高端对话等多元形式就政治、经济、社会、能源环境、公共卫生等领域进行了深入讨论和热烈交流，与会代表在经济增长格局与动力、环境与卫生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绿色能源转型、亚太合作形势、自贸区未来建设等方面为上海、中国和亚洲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政策建议和决策参考。

《2014年度上海论坛共识》在闭幕式上发布。《共识》认为，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与亚洲发展崛起形成历史性交汇，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交织影响，国际创新要素流动空前活跃、重组不断加快，赋予了亚洲转型难得的历史机遇，也对亚洲转型提出了严峻挑战。科技创新是亚



洲转型的不竭动力，开放变革是亚洲转型的思想旗帜，和平合作是亚洲转型的坚实保障，绿色环保是亚洲转型的重要支撑。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发展格局，亚洲仍然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稳定来源。亚洲要谋求更大发展，使亚洲变革和世界利益的融合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就必须摆脱对传统路径的依赖，响应时代号召，把握正确方向，进行彻底的转型升级，走出一条富有亚洲特色的超越与创新之路，惠及亚洲各国，造福亚洲人民，向世界传递持续发展的讯息，促进全球经济的再度复苏繁荣。

上海论坛由复旦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新型高校智库复旦发展研究院承办。论

坛发起于2005年，九年来，共有海内外各界精英逾3000人次参会，论坛始终以“关注亚洲、聚焦热点、荟萃精英、推进互动、增强合作、谋求共识”为宗旨，为学界精英、政界领袖、业界翘楚的交流互动搭建平台，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为亚洲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全方面发展与繁荣开拓新视野、贡献新力量，已成为具有重大影响力、号召力的国际性论坛。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照片由上海论坛组委会秘书处提供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召开 2014 年科研项目资助立项评审会



2014 年 4 月 17 日，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召开 2014 年科研项目资助立项评审会议，审议与评定中心 2014 年科研资助立项项目。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张西平教授主持会议，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白淳、丁超、傅荣、郭棲庆、郭笑文、李永辉、罗小东、苗春梅、邵建国、史铁强、张朝意、张宏、魏崇新等出席。

会上，中心副主任郭棲庆教授简要回顾了中心 2013 年的主要工作成果，介绍了 2014 年科研项目申报情况，通报了本年度学术著作资助出版立项专家匿名评审结果，详细说明了 2014 年项目资助额度安排与评审要求。

与会委员肯定了一年来中心在《亚洲研究动态》的编辑与出版、数据库建设、学术著作出版、科研项目资助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希望中心继续做好科研项目资助工作，严格立项与结项评审，建议进一步加强对信息汇总项目申报的指导，发挥中心在信息收集与研究方面的作用，为

提升学校教师的科研能力和科研成果水平创造更多有利条件。

经过与会委员们的认真审阅，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最终评定出本年度中心拟资助立项的 38 个项目，其中课题研究项目 24 个、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6 个、信息汇总项目 3 个、学术会议项目 5 个。项目选题涵盖了哲学、比较文学、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计算机应用、法学、语言学、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学、修辞学、国际问题研究等 12 个学科领域。学校亚非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欧洲语言与文化学院、英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院、专用英语学院、法学院、日语系、阿拉伯语系、计算机系、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等 17 个学院、系部的教师和研究人員参与了本年度的项目申报工作。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北京外国语大学承办博鳌亚洲论坛 “亚洲文化与企业发展新动力”分论坛

2014年4月10日，北京外国语大学承办博鳌亚洲论坛“亚洲文化与企业发展新动力”分论坛。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彭龙作为主办方代表首先致辞。他指出，亚洲各国文化相通，血脉相近，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色。基于这种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亚洲企业在发展中同样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品牌。彭龙表示，北外十分重视亚洲文化研究，致力于为国家发展提供优秀人才储备。本次分论坛，

是北外为深入推进亚洲文化交流和亚洲经济发展而举办的一次盛会。他希望通过这一平台，与亚洲的企业家、文化产业的领袖们开展沟通对话，凝聚共识，向亚洲的朋友们介绍中国的发展，阐释中国的文化，使亚洲文化在亚洲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印度计划委员会委员阿伦·迈拉、斯里兰卡教育部部长班杜拉·古纳瓦拉特纳、中国外交部原部长李肇星、博鳌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广东志毅雅典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志明、北



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彭龙、DMG 印纪娱乐传媒集团创始人吴冰、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作为讨论嘉宾，共同就“亚洲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亚洲当代文化价值的意义”、“亚洲企业如何将亚洲文化价值转化为自身发展的新动力”等话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并在提问环节就如何激发青年一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北外如何高效培养跨文化交流的人才，大学生如何承担起传播中华文化、亚洲文化的使命等问题与现场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

分论坛由阳光媒体集团、阳光文化基金会主席杨澜主持。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执行总监吴骏，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韩震、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科研处处长张朝意等出席分论坛。

本次分论坛的举办，旨在促进亚洲多元文化转化成亚洲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活力，为

中国和亚洲企业“走出去”提供智力支持，为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北京外国语大学长期以来致力于文化的传播，承担起“让中国了解多样的世界，让世界理解变化中的中国”的双重使命。学校已开设了 60 种外国语言，完整开齐了亚洲东盟十国语言，与世界上 72 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 多所大学和学术机构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承办了 20 所海外孔子学院，每年有 1000 余名亚洲留学生在北外学习。学校以多语种多学科为学术特色，注重中华文化修养和多元文化教育，致力于培养具有跨文化交流能力的领袖学生。

博鳌亚洲论坛成立于 2001 年 2 月，目前已成为亚洲以及其他大洲有关国家政府、工商界和学术界领袖就亚洲以及全球重要事务进行对话的高层次平台。



阿伦·迈拉



班杜拉·古纳瓦拉特纳

附：论坛发言摘登（嘉宾顺序按音序排列）

阿伦·迈拉：互相尊重是中印两国共同的文化特点

印度计划委员会委员阿伦·迈拉认为，互相尊重是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共有的特点。身处全球化的世界，尊重他国文化，共赢共生是世界各国共同进步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印两国文化都倡导并重视尊重他国文化，并与之共生共存。

阿伦·迈拉将中印两国这一共同的文化特点与经济挂钩，称互相尊重同样可以运用于经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以及企业的经营中，身为企业家的他认为，制定规则过程中只有

更多倾听别人的意见，尊重公平公正的原则，才能实现共生共赢。同样，在企业管理中垄断性的统一意见会抹杀创新的动力，对企业增长非常不利。

班杜拉·古纳瓦拉特纳：亚洲学校需加强职业教育

斯里兰卡教育部部长班杜拉·古纳瓦拉特纳表示，亚洲文化是一个充满了人文主义色彩的文化，亚洲文化重视家庭、重视社会发展，极为包容。亚洲国家的父母非常重视教育，教育对文化的发展非常重要。班杜拉认为，亚洲



李肇星



龙永图

的大学及中学需要对学生进行更多的技术教育。在他看来，亚洲部分国家存在失业、贫困问题主要是由于缺乏教育造成的。要对广大老百姓、广大学生进行教育，特别是加强职业教育，对解决问题起着关键作用，不应让教育成为少数人的专利。

李肇星：要注重吸收学习他国优秀文化

中国外交部原部长李肇星认为，发扬本民族文化精髓，摒弃糟粕，虚心学习其他地区、其他行业和其他国家优秀的文化和思想，坚持平等待人的原则，对于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维护亚洲的和平发展将具有积极意义。

他特别提到，印度在教育方面比中国更能培养出具有独立生活、工作能力的人才。李肇星称自己在美国工作期间发现在联合国工作的印度青年在人数上超过中国青年，并

且印度青年的独立生活、工作的能力比中国青年强，非常值得我国青年学习。

龙永图：寻求亚洲文化共同点可积极推动经济一体化

博鳌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表示，寻求亚洲文化的共同点对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龙永图认为，“发展是第一要务”，仅仅谈文化的独特性而不谈经济的发展，这种文化的独特性不会具有现实意义。亚洲经济现在处在比较低的发展阶段，必须要尊重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开展经济合作，开展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共同富裕、共同发展的过程中使文化得以交流。

龙永图称，亚洲的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可以从不同文化的共同点中寻找启示，从而凝聚各国经济，促进企业合作。龙永图认为，包容是



梁志明



彭龙

亚洲文化的共同点，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多元包容性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梁志明：当今企业的竞争是文化的竞争

广东志毅雅典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志明站在企业的角度，认为尊重、包容、务实是亚洲文化的核心。他表示，当今企业的竞争已经从最初的产品竞争、服务竞争，逐步转变为文化竞争，文化的障碍将对企业的竞争力形成挑战。他以自身企业发展为例，指出作为国际化贸易的企业，开展产品销售之前，都会首先对各个国家的文化去研究学习。基于这种经验，他们的产品成功打入了比利时和英国的市场。

彭龙：以教育推动文化交融，释放社会发展新动力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彭龙表示，北外致力于研究每个亚洲国家的文化、政治、历史，

希望北外学生未来能够真正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深化各国之间的交往，甚至能够把亚洲跟世界各个地方的文化交融起来。目前，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交流还处于比较初级的状态，作为教育工作者，希望通过学生、通过教育来推动彼此的文化交融。

彭龙认为，亚洲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但是亚洲的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进一步提高。彭龙说，亚洲地区的人均 GDP 是欧盟的五分之一，是北美的八分之一，所以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空间依旧非常大。如何在亚洲文化当中挖掘和释放社会发展的新动力是人们需要思考的新问题。

吴冰：“文化走出去”可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

DMG 印纪娱乐传媒集团创始人吴冰认为，亚洲文化价值最重要的是融合，作为电影投资人的她表示，《钢铁侠 3》的成功表明，



吴冰



袁行霈

中西方文化的有机融合，可以成为彼此文化沟通的重要桥梁。

她表示，中国企业在国际舞台上会遇到很多压力，但同时这些压力也带来新的动力，即把中国文化带出中国，潜移默化地让世界了解中国。作为企业家，吴冰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已经成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盈利点和价值所在。

袁行霈：文化多元性可成为亚洲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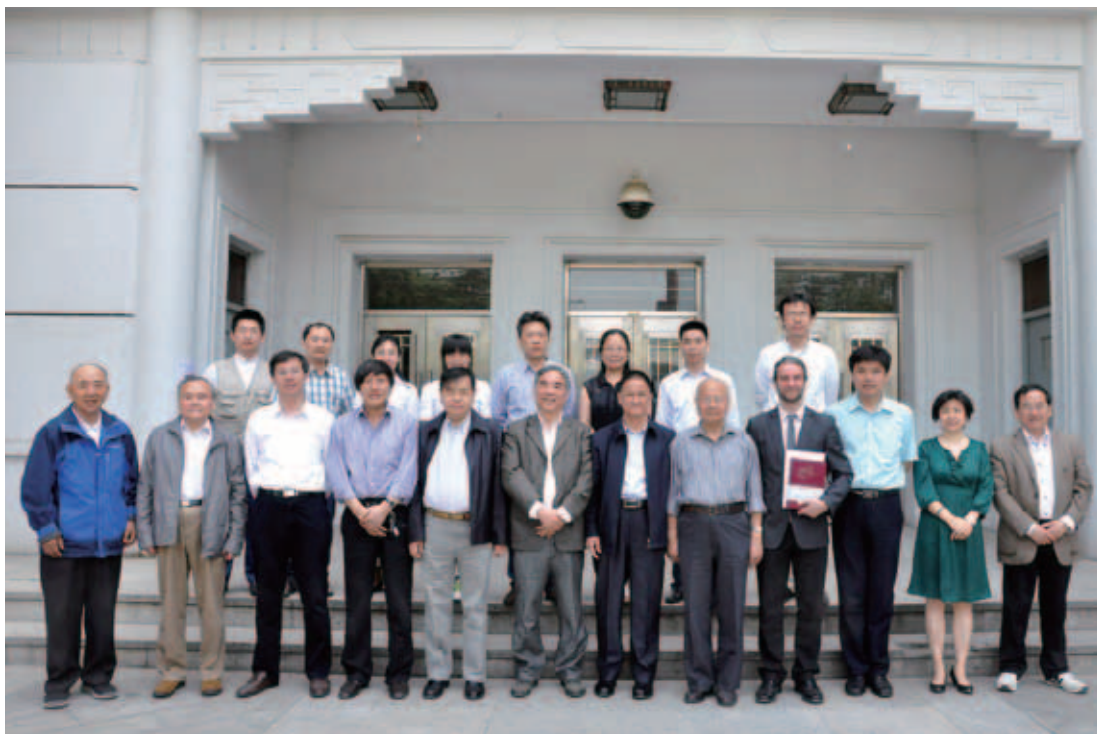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表示，亚洲文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古老，另一个则是多元。

袁行霈说，亚洲文化由各不相同的文化所组成，不同文化有如钻石的多个切面，经过光线的照射、折射可以更加璀璨。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同时也要借鉴外国的文化，包括亚洲的文化在内，使我们自身的文化更加丰富。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把亚洲文化的

多元性转化成亚洲的优势。

在发言中，袁行霈特别表达了对北外的殷切期望，他希望北外能多培养一些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人才，不仅把外文翻译成中文，而且把中国的古典文学、古典哲学、中国传统的智慧介绍出去，相互学习借鉴，相互包容共生，使亚洲文化像多切面的钻石或天上的彩虹，迎来亚洲发展充满生机的春天。

摘自 <http://bfsunews.bfsu.edu.cn/tools/view>.



“波兰中国文化研究的 重大进展·《卜弥格文集》” 出版学术座谈会举行

2014年5月18日上午，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和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共同主办，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协办的“波兰中国文化研究的重大进展·《卜弥格文集》”出版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座谈会集聚了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中

医科学院等国内多所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前来参会，波兰驻华大使馆梅西亚（Maciej Gaca）参赞，著名旅葡学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金国平先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对外合作部许静主任以及《卜弥格文集》的译者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振辉研究员也应邀出席了会议。



卜弥格 (Michel Boym, 1612—1659) 是明末波兰来华传教士第一人，他在西方早期汉学研究的多个领域皆具有开创性意义，他是欧洲历史上最早对中医展开研究的西方学者，第一次将《黄帝内经》、《脉经》等中医著作和中草药翻译介绍到西方，是第一个展开中医和西医比较研究的传教士。此外，他还是第一位第一次在西方公布大秦景教碑的全部中文内容和第一次将碑文全部用拉丁字母注音的传教士，他是西方出版拉汉字典的第一人。

卜弥格的科学著述是多方面的，如《中国地图册》、《中国植物志》、《中国医药概说》、《中国诊脉秘法》等，涉及中国动植物学、医药学、地图学等多个领域。但这些著作在其生前少有出版，不少散佚在世界各地。为了将这位伟大的中学西传的先驱的贡献与著述系统地展现在当代人面前，在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张西平教授的积极组织下，由波兰当代著名汉学家爱德华·卡伊丹斯基与我国知名学者中国社会科

学院张振辉研究员经过长达十余年的搜集、整理、翻译与筹备，《卜弥格文集——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医西传》于2013年1月正式出版。文集包含了目前能够收集到的卜弥格具有代表性的报道和论文等15篇，主要内容包括卜弥格关于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翻译与研究；卜弥格对中华帝国的研究论述；卜弥格介绍来华途经非洲、印度、泰国、越南时对当地的地理环境与风土人情的报告以及友人来往的信件；卜弥格与中医西传。文集的出版弥补了国内早期传教士汉学研究方面原始资料的空缺，亦成为早期中国文化西传及其在域外影响的重要佐证，出版后受到国内学术界积极反馈与热烈反响。

在本次座谈会中，围绕“卜弥格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医西传”这个主题，与会嘉宾与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文集出版的组织者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教授作了“卜弥格与西方汉学的兴起”的主题发言。

发言中，张西平教授从“卜弥格与中国图像西传、汉字西传、中国地理西传、中国植物西传、中医西传”五个方面并配以图稿向与会者们介绍了卜弥格在16—18世纪的中国文化西传欧洲的文化交流中，特别是中医西传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张西平教授认为，通过中国图像西传，卜弥格使欧洲人通过图像认识了一个真实具体的中国，并且这些西传的中国图像中大部分是卜弥格亲自画就的，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在汉字西传中，张西平教授认为卜弥格最大的价值在于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碑文所做的贡献。卜弥格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碑文进行了拉丁文的逐字注音、注义以及翻译，并根据大秦景教碑编著了一部汉语词典，这是西方第一部拉汉字典，对卜弥格以后西欧



卜弥格

新兴汉学家如雷蒙沙（1788—1832）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地理西传中，卜弥格绘制了很多地图，这些地图不仅较之早期和他同时代的汉学家绘制的地图更加准确地反映出了中国的省份、重要城市、河流和长城的地理位置，更改变了欧洲地图师们关于欧洲的一些错误的画法，而且标出了当时中国各种动植物和矿物分布的情况，卜弥格绘制的这些地图在西方汉学的地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植物西传中，张西平教授认为卜弥格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了他生前唯一公开出版的著作《中国植物志》中，从西方汉学史的角度来看，这本书是来华传教士第一本关于中国的植物志，从欧洲对中国植物的认识史来说，该著作也是奠基性著作，它是欧洲第一本关于中国植物的研究和记载，对于后来瑞典植物学家林奈（1707—1778）的现代世界植物分类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医西传中，卜弥格向西方翻译和介绍了中医理论和资

料，还亲自撰写了一些有关中医研究的著作，张西平教授认为卜弥格是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之间的连接点，因为卜弥格对中国医学的研究，直接催生了雷慕沙迈开了他汉学研究的第一步，由此西方汉学拉开了它新的一幕。

座谈会上，其他学者也就自己有关卜弥格的研究发表了论文和报告，如本文集的译者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振辉先生也作了主题发言，围绕自己多年来对卜弥格资料的收集整理翻译与研究，从多个方面阐述了这位中学西传的伟大先驱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所做的伟大贡献。另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耿昇研究员、著名旅葡学者金国平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欧阳哲生教授、浙江大学历史系王永杰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主任赵刚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林梅村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沈定平研究员、南京农业大学王银泉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的相关学者也从自己的学术研究视角围绕“卜弥格与中学研究与西传”的主题发表了论文和报告。

波兰使馆文化参赞梅西亚（Maciej Gaca）在致辞中以波兰使馆名义肯定了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张西平教授和译者张振辉研究员对文集的出版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感谢学者们为卜弥格的价值能够在当代继续发光和延续、为推进中波以及中国与西方文化的交流所做出的贡献，波兰使馆会继续支持和协助推广该文集。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中国文化在亚洲” 系列学术讲座（1-4）举行

2014年4月14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与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举办的系列学术讲座“中国文化在亚洲”第一讲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三层学术报告厅成功举行。本次讲座邀请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王震中教授作了题为“从中国国家形态结构的演进看中华民族与文化的稳定性和包容性”的讲座，讲座由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张西平教授主持。

王震中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国国家形态结构的演变与民族共同体层次的跟进，随后分析了先秦时期华夏民族从“自在”发展到“自觉”的两个阶段。王教授认为，民族的形成应从“自在”民族算起，华夏民族的形成始于夏王朝。“中国”一词的概念，最早指“国之中”，后来扩展为中原，再进一步扩展为华夏民族所居住的黄淮江汉地域。“夏”字义训中国，有了夏朝国家实体才有了华夏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使用“华

夏”、“诸夏”等用语，不仅表明华夏民族已经形成，而且体现了当时华夏民族随着“华夷之辩”的需要和危机感所凸显的民族意识上的自觉。中国国家形态的演变分为五帝时期万邦林立的单一制邦国、夏商周三代的复合制王朝与王国、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帝国三个阶段，相应的民族形态分别为：部族国家、华夏民族和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及其统一多民族国家。夏商周三代复合制国家结构是华夏民族的外在框架，也是维系民族一体性的重要保障。秦汉以来的郡县制国家结构是非常稳定的国家结构，也是以汉族为主体，融合众多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保障。

最后，王教授就维护国家统一的文化措施与中华民族的稳定性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中华民族的稳定性和包容性与历史上国家形态的演变道路相关。在当今国家统一问题上，一国两制的国策既符合历史传统又具有现实合理性。同时，主体民族文化应具有高度文明性和先进性，在尊重和承认其他民族文化的同时，拥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影响力才能促进国家层面的民族团结。

王教授以全新的理论视角从中华文化自身阐述民族与国家的特征，以及其对于现代的意义，讲座生动有趣，在场师生受益匪浅。

2014年4月28日，“中国文化在亚洲”系列学术讲座第二讲举行。本次讲座邀请了著名学者、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的牟钟鉴教授作了题为“孔子仁学与当代文明转型”的学术讲座。讲座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任大援教授主持。

牟钟鉴先生是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宗教学专业学术带头人，



王震中

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牟教授出版的学术专著有：《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中国宗教与文化》、《走近中国精神》、《儒学价值的新探索》等十多部，其中，与张践教授合著的《中国宗教通史》获教育部2003年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宗教学一等奖；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主编《宗教与民族》集刊一、二、三辑，他的学术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民族宗教问题研究的发展。

牟教授从习近平主席近来关于文化方面的重要讲话切入，对中华文化的重要性、定义、作用等方面做了梳理，并特别强调了习主席关于文明之间关系的理解：各文明之间应该消除偏见和对立，用和谐代替冲突。接着，牟教授从“仁”的重要性、“仁”与“礼”的关系变化、“仁”对当今世界的意义、“仁”的实践几个角度，结合国内外史实时事对儒家之“仁”做了深入浅出的阐发。仁之本：孝悌者，人之本物；仁之义：



牟钟鉴



许子根

仁者爱人、同情心、孟子的恻隐之心；仁之方：忠恕之道；仁之行：修己以安百姓，并且针对国际各大文明之间的冲突与国内文化发展中的很多具体问题，牟教授结合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提出了自己的三大命题：一，以仁为体，以和为容；二，以生为本，以诚为魂；三，以道为归，以通为路。同时，从道德建设、教育制度等方面强调了孔子仁学对人类文明转型的意义。

最后，牟教授热情细致地解答了现场师生提出的问题，就儒家文化仁义礼仪在现实中的实践方法与师生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牟教授深入浅出、幽默风趣的演讲风格使师生们在轻松活泼的气氛中加深了对孔子仁学的思考与认识。

2014年5月12日，“中国文化在亚洲”系列学术讲座第三讲举行。马来西亚宏愿教育基金会主席、宏愿大学名誉署理校长许子根博士应邀作了题为“中国文化在马来西亚”的讲座。

许博士首先讲述了孙中山先生在马来西亚的事迹，以及孙中山先生锲而不舍的精神对马来西亚学界和报界的深远影响。

随后，许博士将马来西亚纳入整个东南亚反殖民主义的政治历史背景下，深刻阐述了马来西亚对华族文化看法的演进及其与华族文化的密切联系。他认为，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国家，而且正朝着建立一个全民族团结、成熟、自由开放的多元文化民族目标而努力。马来西亚华人众多，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马来西亚拥有一套从小学、中学到大专的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其华文教育在东南亚乃至全世界首屈一指，而且华文在马来西亚的商界及教育界有着很高的地位，马来西亚华人一直通过报章、文学交流和诸如舞狮、大旗鼓等多种文化形式维护和传承着中华文化。

最后许博士对华族文化的美好未来做了瞻望。他指出，马来西亚应对华族文化采取多元政策，异中求同，而华族文化自身也应自强不息，不断加强与当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今年是中

马建交 40 周年，马来西亚是中国在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中马关系也已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们应不断努力，从文化层面促进中马两国进一步友好发展。

2014 年 5 月 20 日，“中国文化在亚洲”系列学术讲座第四讲举行。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的楼宇烈教授应邀作了题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的学术讲座。

楼宇烈先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任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副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全国宗教学会理事、副会长等，学术成果丰硕，发表论文 80 余篇，主要作品有《国学精神——中国的品格》等。

楼先生首先介绍了文化研究中“比较”的重要性，随即进入讲座主题“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通过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凸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人文”、“以人为本”、“重德行”，并对这些特征进行了具体分析：中国文化从历史上讲，人文与天文、地文相对，天、地、人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三个方面；汉代《淮南子》有曰：“遍知万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谓智；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因此，仁与智是中国圣人的标准。

之后，楼先生从两个方面详细地论述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即以史为鉴、以天为则。从夏、商、周的兴衰开始讲述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史为鉴的重要性，并强调了西方文化是人与神的关系，并且人要服从神的旨意，人是神创造的。然而，



楼宇烈

中国文化是人与天的关系，所谓“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虽然人与万物由天地合气而生，但是天是自然的，是没有意志的，而且这里的“天”也包含了人类的祖先，总之是以人为本的。另外，楼先生还特别讲解了“以天为则”，强调人要向天学习，首先就要学习“天”的无私精神：“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同时提醒我们要警惕“人类中心主义”，主张要回归自然。

楼先生还总结了当代中国文化中的两个突出问题：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例失衡、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失衡，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意见，即“尽人、尽伦、尽职”。他强调正确看待传统文化，珍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在问答环节，楼宇烈先生热情耐心地解答了现场师生的疑问，对很多问题给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由于楼宇烈先生的演讲广征博引又深入浅出，深刻又不失幽默，现场师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受益良多。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欧洲早期汉语词典的编纂及出版¹

杨慧玲 /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摘要

自 16 世纪耶稣会士入华,借助耶稣会的东方传教通信和出版机制,入华耶稣会士成为了“中学西传”的媒介。然而,欧洲学界并不满足于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语言笼统的介绍,凭借入华耶稣会士传入欧洲的中文文献,欧洲东方学家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致力于汉语研究,并在欧洲出版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日后欧洲汉学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本文探究欧洲东方学家汉语学习、词典编纂及在欧洲出版的机制。

关键词

东方学家 汉语 词典 编纂 出版

1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科研资助项目《18 世纪前欧洲汉语词典的编纂及出版》的研究成果。

汉欧双语词典史从 16 世纪末罗明坚、利玛窦编纂汉葡、葡汉词典开始，直到 19 世纪初马礼逊出版世界第一部汉英英汉词典，期间在中国流传的都是汉欧双语词典手稿。而在欧洲大陆，曾经出版过汉欧双语词典。在此，笔者对欧洲历史文化语境中出版的最早三部汉外词典做一介绍。

欧洲的汉语学习、词典编纂及汉语研究是在“中学西传”的背景下发生的。入华耶稣会士成功进入中国之后，亟需吸收更多的人加入耶稣会前往中国传教。借助 16 世纪后半叶耶稣会建立起的东方传教通信出版机制，入华耶稣会士写给欧洲总会长的年度报告和给欧洲教会亲友的书信频繁在欧洲出版。对于在华耶稣会士而言，掌握汉语、了解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在华传教策略的必要基础，他们书信中对中国的语言、文化、历史的介绍刺激了欧洲汉学研究的诞生；而对于广泛汲取知识的欧洲知识分子、对“异国情调”感兴趣的民众和致力于海外扩张的君王而言，在华耶稣会士的报道则满足了他们对神秘东方的好奇心。在这一过程中，在华耶稣会士与欧洲本土汉学家之间有着密切的学术联系。

然而，随着“礼仪之争”的爆发，耶稣会士在争论中所持的立场和观点不仅使整个耶稣会受到其他教派的攻



图 1 《中国图说》中的汉法词典

击，也使耶稣会士的著述在欧洲受到了一定的排斥，这为欧洲本土东方学家们的汉学研究及其著述的出版，提供了绝佳的时机。“礼仪之争”爆发之前，在华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的著述内容非常广泛，在此之后，耶稣会在欧洲的出版一边倒地侧重于中国典籍外译，客观上造成了汉语语言学著述的缺失，而此时欧洲东方学家们对汉语语言有着专一的兴趣和极大的热情，这也是促成欧洲出版汉外词典作者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门采尔（Christian Mentzel, 1622—1701）、巴耶尔（Gottlieb Siegfried Bayer, 1694—1738）等人进行汉学研究的另一个原因。

一、基歇尔与欧洲出版的第一部汉法词典（1670）

基歇尔，享誉欧洲的著名学者、耶稣会士，他“被称为‘自然科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机械学家、哲学家、建筑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东方学家、音乐学家、作曲家、诗人’”。¹在熟悉自己国家历史地理的中国人眼中，从未来过中国的欧洲人基歇尔所著的《中国图说》显得陌生甚至荒谬（见图 1）。然而，由于基歇尔在欧洲享有无可匹敌的学术声望，《中国图说》“出版后 200 多年内，在形成西方人对中国及其邻国的认识上，基歇尔的《中国图说》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著作”。²

1 【德】阿塔纳修斯·基歇尔著，张西平、杨慧玲、孟宪译：《中国图说》之序《神奇的东方——中译者序》，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 年。

2 同上。同参张西平：《17 世纪德国汉学研究——以基歇尔、米勒、门采尔、巴耶尔为中心》，载《中国文化研究》2008 年第 4 期。

1670 年法文版的《中国图说》有一个法汉词典 (*Dictionnaire Chinois & Francois*) 的附录。马西尼教授认为这个 44 页的中法词典“可以被视为第一部、甚至跨越一个世纪唯一的一部印刷版汉欧字典。”¹显然,从未到过中国的基歇尔不可能是这部汉法词典的作者,基歇尔与卜弥格 (Michael Boym, 1612—1659)、卫匡国 (Martino Martini, 1614—1661)、白乃心 (Johann Grueber, 1623—1680)、曾德昭 (Semedo Alvaro, 1585—1658) 等来华耶稣会士都有密切交往,仅依靠历史记录尚无法确认作者。马西尼通过研究词典注音追踪作者,也因受文献限制,未得出最终结论。

这部汉法词典收录 2493 个词目,按照给汉字注音的拉丁字母排序,提供法语对应词。像所有早期汉欧双语词典一样,词目都是字、词和短语混杂的形式。这部汉法词典没有汉字,而是以汉字的拉丁字母注音替代汉字,它的出版也仅是为了满足欧洲读者的猎奇心理,基本上没有实用价值。

然而,基歇尔在《中国图说》中收录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欧洲汉学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注音和拉丁文对译词是由卜弥格和他带回欧洲的两名中国人合译的。²基歇尔书中所收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采用了三译法,首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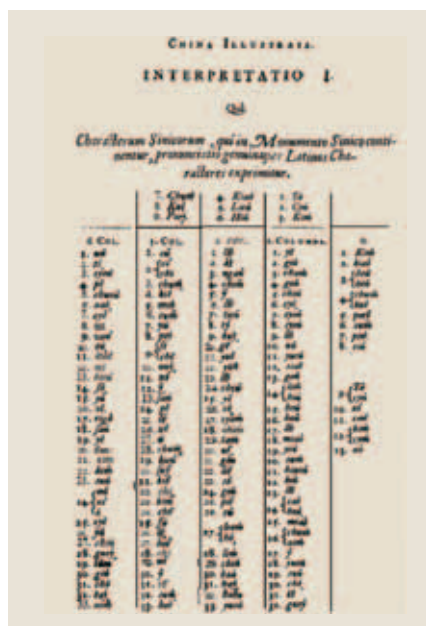


图2 拉丁字母注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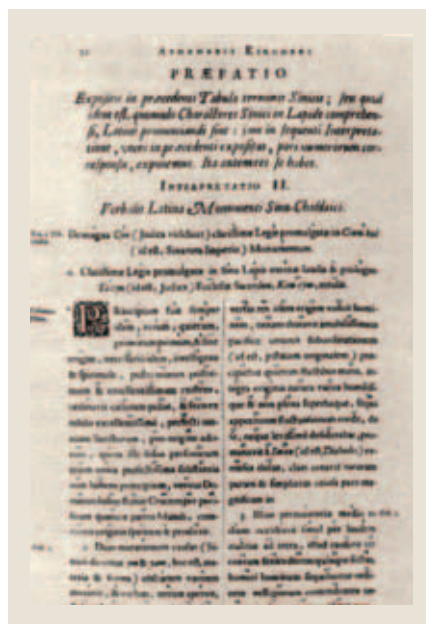


图3 拉丁文对译

将所有的汉字进行编号,其次对每行的每个汉字用拉丁字母注音(见图2),最后再进行逐字拉丁文翻译(见图3),汉字、注音及拉丁文对译词之间全都依赖编号一一对应。虽然碑文的编排形式不是词典,但是在历史上,尤其在17世纪被作为词典和汉语学习教材存在并被使用,由此进入了欧洲汉学史。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欧洲出版的《中国图说》中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首次印刷出版了大量的汉字(汉字共1662个,少部分汉字有遗漏),并且对碑文中有编号的汉字进行了拉丁文注音和对译,对欧洲学者而言,这是弥足珍贵的关于中国语言的一手文献。这与1585年门多萨出版《中华大帝国史》时在欧洲首次发表的三个汉字相比,已经是质的飞跃了。虽然这些汉字由欧洲人抄写,一些汉字常出现缺笔或者增笔等各种笔误,转译过程中所提供的拉丁文对译词也存在相当多的错误,但这样一篇对基督教至关重要的汉外双语文章的印刷流通以及基歇尔享誉欧洲的名望,都增加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欧洲的影响力。笔者推断“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的大量汉字应是在金属版上用腐蚀液腐蚀或直接用针或刀刻制而成的,其原理与铜版画相同。否则,仅出版此书就需要制作大量的汉字活字,这在当时的欧洲仍是相当费钱费力的事情。

1 【意大利】马西尼著,杨少芳译:《对欧洲出版的第一部中文字典的注释》(1670年),《国际汉学》第18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

2 关于基歇尔与卜弥格的关系,详见【波】卜弥格著,【波】爱德华·卡伊丹斯基波兰文翻译,张振辉、张西平中文翻译:《卜弥格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二、门采尔与拉汉字汇(1685)

门采尔, 原本是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 I) 大选帝侯的御用内科医生, 植物学家, 1685 年当选为普鲁士医学院的院士。他在六十岁高龄时才开始自学汉语, 从未到过中国, 却对汉字颇为痴迷。大选帝侯腓特烈对中国也有着浓厚的兴趣, 不吝重金购买并收集有关中国的书籍,¹ 重薪聘请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 到柏林指导门采尔。耶稣会士闵明我(Claudio Flippo Grimaldi) 途径柏林时, 也曾帮助门采尔学习和研究汉语。1685 年起, 门采尔兼任大选帝侯王室图书馆馆长, 负责采购保管珍贵的汉籍。1692 年门采尔退休之后, 仍继续他的汉学研究。门采尔时常提到《字汇》、卫匡国的汉语语法、多明我会 Francisco Diaz 的汉外双语词典, 在腓特烈的支持下, 他也出版中文著作, 其中有一个作为附录出现的《拉汉字汇》(*Sylloge Minutiarum Lexici Latino Sinico*, 1685, 见图 4、图 5)。

《拉汉字汇》以拉丁语词为词目, 按拉丁语词首字母 A—Z 的顺序排列词目, 常常是一两个拉丁词对应一个汉字, 个别拉丁语词对应两个汉字, 如“ex”对应的是“之中”。《拉汉字汇》仅收录约 529 个拉丁文词目, 对应五百余个汉字。



图 4 拉汉字汇的封面



图 5 拉汉字汇的首页

《拉汉字汇》中的汉字是欧洲人书写的, 因此, 常有笔误或缺损增加笔画的。经笔者调查, 发现门采尔《拉汉字汇》的汉字注音方案基本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的注音相同, 有些细节如注音符号等略有不同, 更为蹊跷的是, 同一个汉字在门采尔的《拉汉字汇》中的拉丁文对译词, 往往与大秦景教碑中的对译词极为接近或相同。门采尔很可能是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底本, 按照词表的编排法, 重新进行了排列和整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汉拉对译版在欧洲汉学史上的影响力。

虽然门采尔的《拉汉字汇》看似非常单薄, 只有与同时期出版的另一部汉学著作相比, 才能凸显《拉汉字汇》的价值。门采尔的汉学老师柏应理 1687 年在法国巴黎出版了《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一书。柏应理原计划在《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的译文中加入一些汉字, 这也是欧洲学者们所期待的, 然而, 由于在欧洲出版印刷方面的实际困难, 他放弃了初衷。门采尔的《拉汉字汇》中的五百多个汉字都是木活字印刷, 而这些中文木活字的制作则要归功于门采尔之前的大选帝侯王室图书馆馆长米勒(Andreas Müller, 1630—1694)。米勒对汉语

1 关于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的汉籍藏书, 见张国刚:《中国人编写的葡汉词典——柏林国立图书馆“汉学书库”访记》, 载《中华读书报》1999 年 11 月 3 日。另有杨慧玲:《德国图书馆中文藏书述要》, 惑问 WAKUMON:No.17 (2009), 日本:关西大学出版。

的研究主要靠基歇尔《中国图说》中的汉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他宣称自己找到了快速掌握中文的“中文钥匙”（Clavis Sinica），¹ 因此获得大选帝侯慷慨的经费资助，在充裕经费的支持下，米勒制作了这批汉字活字并将其留给了帝选侯图书馆。门采尔充分利用了这批汉字活字出版了《拉汉字汇》，出版后还将《拉汉字汇》送给了柏应理，柏应理在回信中对门采尔的书大加赞赏。以柏应理的汉学学识来看，这种赞赏并非是对《拉汉字汇》本身的肯定，而是对门采尔孜孜不倦研习汉语的肯定，也有对他克服困难在欧洲出版《拉汉字汇》的肯定。从学术史上看，《拉汉字汇》的出版价值远高于它的学术价值。

图6是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藏汉字字模，全部为木活字，保存良好，有专门定制的柜子收纳汉字字模。值得注意的是，正方形、大字活字字模因带边框，并不适合中文印刷出版，而图右下角的一些长条形汉字模板，很可能被门采尔用于中文出版。²

三、巴耶尔与中文博览（1730）

巴耶尔自幼就聆听教父向家人提到米勒神奇的《中文钥匙》一书，而他的教父很可能就是为米勒刻写汉字



图6 柏林国家图书馆藏 17 世纪制作的汉字木活字

字模的工匠，巴耶尔因此笃信任何人都可以在短期内自学学会汉语。他具有出色的语言能力，对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都颇为精通，从19岁开始钻研汉语，试图发现汉字及汉语语法的规律。而真正有机会接触汉籍则是通过柏林王室图书馆，研读并抄写门采尔留下的手稿、文章以及藏书。在研习汉语过程中，他也痛苦地认识到，在欧洲仅凭自学是无法掌握汉字的读音并与中国人交谈的，但这并不妨碍他的汉学研究。1726年，巴耶尔到俄罗斯圣彼得堡新创建的科学院任职，

主攻古希腊、古罗马史研究，由于他越来越痴迷于汉学研究，后来转为东方学教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阿拉伯语、波斯语甚至蒙、藏、满语的文章。而他最专注的汉语研究，受益于他从柏林王室图书馆抄写的汉西手稿词典、早期的一些汉学手稿、耶稣会士的书信。1730年，他在圣彼得堡出版了《中文博览》（*Museum Sinicum*），这是欧洲出版的首部专门分析中国语言的学术专著。

巴耶尔在《中文博览》中首先分析了他所知道到的汉字的起源和本质，之后是汉字篇，继后是语法篇，漳州方言篇，还收录了在欧洲流传的《大学》《小儿论》中的短篇作为课文。从该书的布局来看，巴耶尔想要写一部全集全解性质的汉字汉语著作。然而，由于该书有限的篇幅，以及巴耶尔所具有的有限的汉语水平，他的目标并未完全实现。他对于这些汉语文献的来源非常坦诚，多次提到门采尔关于汉语的文章及手稿，门采尔收藏的那部 Francisco Diaz 的手稿汉拉词典，《大学》中的两节译文也摘自门采尔，此外，他还参照了欧洲出版的在华耶稣会士如卫匡国、柏应理等人的著述。

仅就汉字篇来看，丹麦学者龙伯格（Knud Lunbæk, 1694—1738）

1 笔者在欧洲遍览米勒的书，他的书中极少出现汉字，据此可以判断他的《中文钥匙》有夸大之嫌。1748年他去世后出版的书中竟然把日文字母当作汉语字母“Alphabetum Chinense”，其余汉字短文也都是抄自入华耶稣会士。

2 这批木活字藏在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汉学书库内，张国刚称其为镇库之宝，认为这批字模没有真正用于印书。笔者图中所示的左边大字字模基本上同于张国刚所说，并非是中文出版所用。但是，笔者在汉学书库查看这批珍贵的木活字字模时，注意到处于一角的长方形字条，如图中右下角所示，这些很可能是17世纪欧洲用于出版汉字的字模。笔者曾与日本高田时雄教授探讨过，他赞同笔者的推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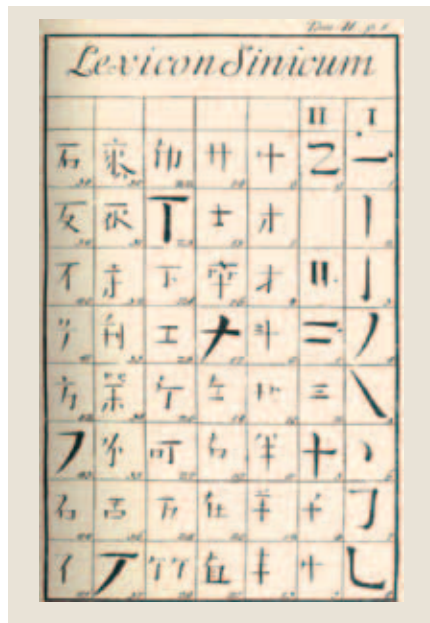


图7 巴耶尔的字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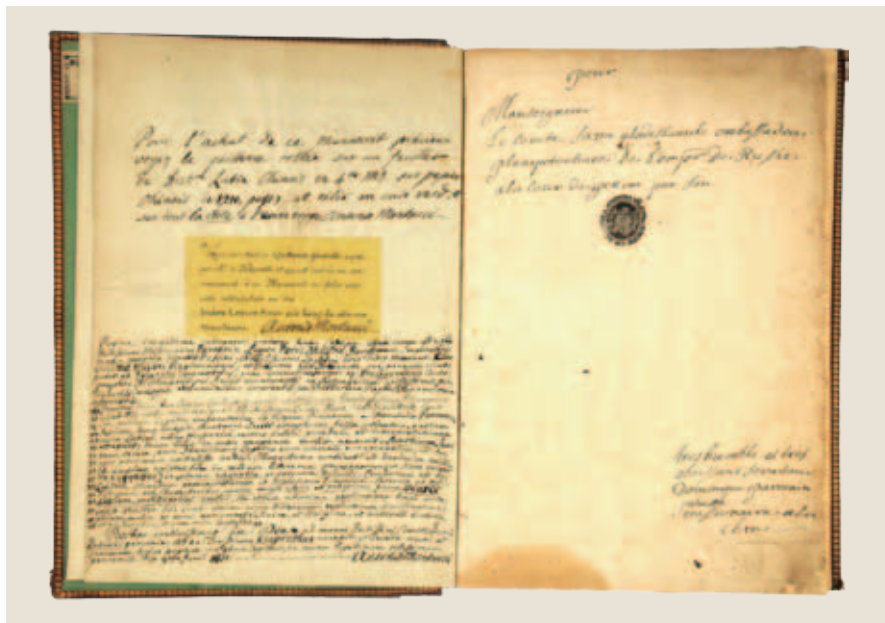


图8 巴多明赠送巴耶尔的汉拉词典抄本

的专著《汉学先驱巴耶尔》¹虽然用“dictionary”对译原标题“Lexicon Sinicum”，但从内容上看，巴耶尔书中的这一部分算不上“词典”(dictionary)。巴耶尔根据汉字214部重新编排了一个字表(见图7)，字表中汉字部首、笔画与汉字杂糅，这是他试图探寻汉语中那些类同欧洲语言“字根”的部首或笔画，以及由它们构成的相关汉字，对汉字构字法的研究成果。像基歇尔一样，巴耶尔给每个汉字或部首笔画标号，并提供了部分汉字对译，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字表具有一定的双语词表的性质。然而，这一部分的汉字书写极为糟糕，错字笔误比比皆是，这样以讹传讹的词表在历史上并未产

生实质性的影响，仅为巴耶尔在学界博得了汉学家的名望，而巴耶尔自认为他的《中文博览》超过了过去所有人的汉学著作。

龙伯格等欧美学者对巴耶尔去世前未曾完成的另一部汉拉大词典颇感兴趣。巴耶尔因收到了驻华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 1663—1741)赠送的一部汉拉词典抄本(见图8)，还有从北京获得的中文字典《字汇》《海篇》，加之与巴多明的通信和友谊，使他坚信他的汉语研究将会取得突破性地进展，成为欧洲汉学界开创性的人物，于是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汉学研究中去。1732年，巴耶尔开始编写《汉拉大词典》。

巴耶尔研究了巴多明送给他的在华传教士编写的汉拉词典抄本后，认为这部汉拉词典的汉字词目编排方式对欧洲人来说几乎无法使用。其实，这部汉拉词典抄本是按注音排序，对在中国生活、与中国人有直接接触的欧洲人在听到陌生汉语字词、查阅汉字来说是最有效的工具书，但是远在圣彼得堡以汉字读写为主的巴耶尔更青睐中国传统字书(如《字汇》)根据汉字字形归纳的部首排列法编排词典。巴耶尔向来视汉语的214部以及部首排序法为解读汉字奥秘的必要工具，无视在华耶稣会士友人对他的告诫：在欧洲没有中国老师教授的情况下自学汉语是无法完全理解汉语语言

1 Lunbæk K, Bayer T. S., *Pioneer Sinologist*, Virginia: Curzon Press, 1986.

的，汉字的书写并不同于中文字书的印刷体。这也是婉转批评他的《中文博览》一书，然而巴耶尔仍执着地继续他的汉语研究和《汉拉大词典》的编写，从《字汇》中翻译一部分内容以补充汉拉词典，直至 1738 年巴耶尔的早逝才使得《汉拉大词典》的编纂不了了之。

四、结语

回顾历史上欧洲早期出版的三部汉外词典以及它们的出版过程，这一段历史与欧洲早期汉学史有很多交叉。欧洲东方学家的汉学研究是继入华耶稣会士之后，与入华耶稣会士的研究大相径庭的一个独特的学术传统。这些作者都未来过中国，都是著名的东方学家，仅凭入华耶稣会士提供的信息和文献就致力于汉语的研究，求知的勇气可嘉。与入华耶稣会士相比，他们没有机会亲临中国学习汉语，但他们对汉语研究十分专注和好奇，因此，在汉语著述极度匮乏、对汉语充满各种奇异猜想的欧洲，¹ 欧洲本土东方学家的汉语研究和著述仍具有一定的价值。藉此，欧洲人才得以一窥汉语的奥秘，基歇尔、门采尔、巴耶尔等人的汉学著述仍然是欧洲人了解中国语言的钥匙。从这个意义上看，基歇尔、门采尔、巴耶尔等人是欧洲汉学史上当之无愧的启蒙人物，他



们的汉学著作也是欧洲汉学史的里程碑之一。

这些欧洲东方学家的汉学研究，虽然曾受到欧洲君主的资助，但在 18 世纪初期，尚不具有萨义德所说的具有殖民、统治色彩的东方学内涵。18 世纪的欧洲对东方语言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东方语言主要指的是欧洲近东地区的语言，如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埃塞俄比亚语、亚美尼亚语以及波斯语等，远东的语言如汉语、日语都已经进入了欧洲东方学家的视

域。在本文中，门采尔和巴耶尔对远东语言如汉语的研究，多是出于学识广博的语言学家个人的兴趣和热情而进行的纯粹学术探究（虽然支持他们汉学研究的机构或赞助人或许具有某种企图），他们的汉学研究也会受知识和观念的主观局限，然而，他们的汉学研究是以学术求知为终极目标，学术性超越政治性。

1 虽然在华耶稣会士早在 1628 年在中国刻印出版了《西儒耳目资》，现在欧洲一些图书馆档案馆也有收藏，然而，在 17 世纪到 18 世纪初期，《西儒耳目资》并不为欧洲学界所知所用。此外，在华耶稣会士学习汉语编写的汉语词典和语法等语言学工具书，传入欧洲的寥寥数部也被视为珍稀之物被收藏，未能在欧洲出版就意味着没有进入到知识流通领域，因而，对欧洲汉学的实质性影响不大。



孔子学院在中外人文交流中的作用： 以爱尔兰孔子学院为中心¹

王展鹏 /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郝立英 / 河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

本文在对爱尔兰两所孔子学院运作情况梳理的基础上，探讨了其在爱尔兰中国学发展中的角色，并进一步从教育合作、文化交流、华人华侨融入当地社会、友好城市交往等层面分析了孔子学院的独特作用。作者认为，在历史上中外人文交流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孔子学院以其多维度的跨文化交流属性，具有推进人文交流的更大空间和潜力，对孔子学院如何在中外人文交流中发挥更大效用的命题也有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

中外人文交流 孔子学院 爱尔兰中国学 中国文化“走出去”

¹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科研资助项目《孔子学院在爱尔兰中国学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启示》的研究成果。

人文交流是国与国之间关系发展的桥梁和渠道，也是中国外交的新路径。近年来，孔子学院在推动中外人文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爱尔兰设立的两所孔子学院利用后发优势，积极进行机制创新，在推进中爱人文交流中扮演了独特角色。

一、孔子学院在中外人文交流中的作用

近年来，在我国外交实践中，人文交流与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一起，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三大支柱，人文交流助力于夯实国家间关系的社会民意基础的作用日益显现。人文的概念包括广义的文化内涵和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¹人文交流则是中外在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媒体等领域开展的跨国交流、传播、沟通等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也是人文交流的资源基础，同时赋予了人文交流鲜明的跨文化属性。这一属性同时意味着人文交流不一定需要借助宏大的事件，而需要更多关注细节，通过机构建设、特定群体或个体间的交往乃至个人的体验，在润物细无声之中潜移默化地发挥增进了解、促进双边关系发展的作用。中外人文交流的内容既包括广义

孔子学院在推广中华文化、发挥公共外交功能、增强国家软实力方面的作用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国际教育、对外汉语教学、跨文化传播乃至国际政治经济等学科日益成为研究热点。

的人类文明成果的交流，也包括本国文化在对方的传播。从这种意义上说，人文交流是国家公共外交的组成部分，其主体具有多样性和民间参与性强的特点，而教育文化机构则是人文交流的重要主体。

截至2013年9月，我国已在全球建立了435所孔子学院和644个孔子课堂。²孔子学院在推广中华文化、发挥公共外交功能、增强国家软实力方面的作用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国际教育、对外汉语教学、跨文化传播乃至国际政治经济等学科日益成为研究热点。³相关研究既有对孔子学院发展基本情况的追踪研究，也有文化传播、国家软实力建设方面的学理思考。在西方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了孔子学院在促进中外理解与交流、创造商业机会方面的

积极作用，但也有一些研究者对孔子学院的成效提出质疑，甚至将其视为中国政府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扩张”工具。

21世纪初以来，文化在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凸显，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要求日益增长，决策者和学术界对于孔子学院在中外人文交流中的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孔子学院成立以来，汉语教学一直是其主要任务。孔子学院章程总则规定其宗旨为“致力于适应世界各国（地区）人民对汉语学习的需要，增进世界各国（地区）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教育文化交流合作，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构建和谐世界。”⁴

分布在世界各国的孔子学院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根据所在国历史、文化状况探索差异化发展的路径，发展模式呈现出多样性。除汉语教学外，各国孔子学院积极参与所在国中国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其特色和主攻方向涉及商务、金融、艺术、中医、体育、法律等多个领域，逐渐突破了传授汉语的单一功能，形成了建设“综合性中外文化交流平台”的新共识。2012年，国家汉办推出了“孔子新汉学计

1 金正昆、唐妮娜：《当代中国外交的新路径：“人文外交初探”》，载《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8期。

2 关于孔子学院/课堂 [EB/OL], http://www.hanban.edu.cn/confuci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 2013-10-15.

3 吴飞：《孔子学院与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James F. Paradise,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Harmony: The Role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Bolstering Beijing's Soft Power, *Asian Surv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4 孔子学院章程 [EB/OL], http://www.hanban.edu.cn/confuciusinstitutes/node_7537.htm. 2013-10-01.

划”，致力于通过中外合作培养博士、接受访问学生、学者、青年领袖来华学习、举办国际会议和学术出版等项目，培养新一代青年汉学家和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推动国际汉学、中国学教育及研究的发展和繁荣。¹2013年，国家汉办出台的《孔子学院发展规划：2012—2020年》进一步提出：进一步加强孔子学院建设，有助于推动中外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为中外在多领域合作共赢提供人才支撑。²

二、爱尔兰孔子学院在中爱人文交流中作用的案例研究

爱尔兰在20世纪初独立建国后对除英、美之外的国家关注不足，加入欧共体后，对外关系的重心转移到欧洲。直至21世纪初，爱尔兰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仍相对不足，中爱人文交流的发展相对其他西欧国家也处于滞后状态。

（一）爱尔兰孔子学院的机制特色

都柏林大学于2006年成立了中国研究院和爱尔兰首家孔子学院，聘请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中国项目负责人、经济学家王黎明担任研究院主任和孔子学院外方院长。中国研究院是爱方机构，偏重中国经贸问题研究和商科（中国商业文化）研究生培养；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孔子学院只是亚洲学院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爱尔兰人看来，孔子学院是该校中国乃至亚洲研究机构的品牌和代名词。

孔子学院负责汉语教学和书法、绘画等中国文化课程。但自孔子学院成立之日起，两机构就实现了深度融合，不仅场所完全共享，教学研究人员也具双重身份，孔子学院理事会与爱方研究院理事会的组成人员完全重叠。所有教学和学术活动实现了一体化，使爱尔兰中国研究院的研究职能和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文化传播职能相互补充、融为一体。

与都柏林大学孔子学院相类似，科克大学中国研究院和孔子学院成立于2007年初，聘请在英国任教的体育史专家凡红教授担任外方院长。该院除承担汉语教学外，还开设了当代中国历史、文学、哲学、宗教、商务、政治经济等课程，建立起较完整的本科和硕博学位研究生中国学课程体系，在校生达200多人。2009年该校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教学院系建制的亚洲学院。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孔子学院只是亚洲学院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爱尔兰人看来，孔子学院是该校中国乃至亚洲研究机构的品牌和代名词。

（二）孔子学院在汉语推广中的作用

21世纪初，爱尔兰只有2—3所院校开设汉语选修课。孔子学院成立后，建立了中国研究专业，各学科、各层次学生选修汉语人数逐年递增。它们还通过合办孔子课堂等方式支持其他院校建立了中国语言文化方面的系科，帮助多家中等学校开设汉语和中国文化课程。爱尔兰教育部2012年决定自2014年起面向爱尔兰所有初中学生开设中文课程，成为欧洲第一个将中文作为正式课程列入中学教学大纲的国家。汉语教学在爱尔兰中学从边缘学科发展为主要学科，为汉语成为高中正式课程打下基础，对欧洲其他国家将汉语作为正式课程引入中学课程体系也提供了借鉴。

两所孔子学院是这一进程的全方位参与者和推动者。首先，在将汉语纳入中学外语教学大纲的论证过程中，都柏林大学孔子学院根据全国中学的大规模调查发布了研究报告，为爱政府决策提供了基础数据。³其次，为应对中文进入普通中学课堂的新情况，该院建立汉语教师培训中心并计划开

1 孔子新汉学计划 [EB/OL], http://ccsp.chinese.cn/article/2012-11/09/content_469694.htm. 2014-10-20.

2 《孔子学院发展规划：2012—2020年》，载《光明日报》2013年2月28日。

3 UCD Confucius Institute: Chinese, a Curricular Subject for Irish Post-Primary Schools [EB/OL], http://www.cii.ie/index.php?c=project&t=project_detail&id=3. 2013-10-22.



设国际汉语教育硕士学位课程，为相关孔子课堂和中学培养爱尔兰本土教师，初步改变汉语教学长期依赖汉办派遣教师和旅爱留学生的局面。此外，该院还组建了爱尔兰中文教师协会，通过集中培训和互联网教学资源分享等方式向中文教师提供帮助。

科克大学孔子学院成立后一直在当地中小学校开展汉语推广工作，大规模开设中国语言和文化课程，同时积极开发汉语教材，参与了与爱尔兰教育部等机构合作编制全爱初中中文教学大纲和教材工作。该院通过建立全爱汉语教学与学习协会，举办汉语教师培训工作坊，联合爱尔兰开设汉语课程的大学和中学，从爱尔兰特殊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入手就爱尔兰人汉语教学和习得的特点与策略开展系统研究。

（三）孔子学院在促进中国研究发展中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两所孔子学院都把推动中国研究作为扩大自身影响、树立学术品牌的突破口。面对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等英美各类中国问题研究机构的竞争，两所孔子学院都立足自身既有研究优势作为最初阶段教学与研究的重点，同时，将其研究在最大程度上与爱尔兰的历史文化情境相结合。

都柏林大学孔子学院依托该校商学院开展了中爱商业文化的跨学科比较研究。该项目研究发现，两国文化在很多方面有相通之处，如注重关系、“面子”、在执法中存在较大的灵活性等；这些共性是两国历史上农业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占主导地位时间长、

海外移民多和遭受外国入侵等因素的结果。¹ 科克大学孔子学院则借助其在体育史、体育社会学领域的专长，开展体育历史发展及其与中国社会、文化变迁间关系的教学与研究。利用北京奥运会和伦敦奥运会前后体育文化研究在中国和英伦三岛成为显学的契机，逐渐发展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知名的中国和亚洲体育文化研究重镇。该院首篇博士论文主题是《体育与民族主义的根源：中爱比较研究》。该文追溯清末以来中国有关体育强国的思想，探讨了义和团运动、绍兴体育会等体育团体在反对列强入侵和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并与盖尔体育协会等组织在爱尔兰独立运动中的作用做了比较。作者提出，在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的中国与爱尔兰，体育都承担了直接或间接服务于民族解放运动和促进民族国家认同的双重使命。

同时，两所孔子学院在爱尔兰人（如赫德、马夏尔尼）在中英关系中的作用等传统中国学研究领域努力发掘新问题、新视角和新范式。这些研究表明，爱尔兰历史和文化经历的复杂性使其文化心理中既留有昔日大英帝国殖民者的痕迹，又表现出被压迫民族追求平等的愿望。例如，在赫德研究中，爱尔兰学者积极为赫德的爱尔兰身份正名；与英国主流话语中居高临下的殖民心态解读不同，赫德的形

1 Lan Li, Cathal Brugha and Liming Wang: *Irish and Chinese Business Culture Similarities and their Social and Historical Reasons* [C]. //The 22nd CEA (UK) and 3rd CEA (Europe) Annual Conference, Dublin: UCD, July 14-15, 2011.

象不再是一位文明的西方绅士在教化野蛮的东方人，而是更多地以平等的心态融入了中国社会。¹

孔子学院还确立了以现当代中国的重大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特别是以中爱关系为重点课题的研究方向。代表性的成果是科克大学孔子学院编辑出版的《爱尔兰的亚洲战略与中爱关系》。²该院还发掘爱尔兰建国后在国联和联合国中的对华政策档案，涉及九一八事变和日本策动建立伪满洲国事件中爱尔兰在国联的公正立场、联合国成立之初爱尔兰内部有关对华关系的讨论。他们注意到，早在1957年，爱尔兰就在联合国大会提出准备投票支持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联合国席位问题，1971年爱尔兰政府再次积极支持相关议案。³此外，孔子学院和相关机构合作主办学术会议也成为推动爱尔兰中国学发展的平台，如都柏林大学孔子学院2011年和2012年承办的欧洲中国经济学会、英国中国经济学会年会。

（四）孔子学院在教育、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凡红教授关于中爱教育交流的研究表明，爱尔兰的孔子学院的建设促进了爱尔兰公众对中国的了解，使21



世纪的爱尔兰人能够更有效地与中国打交道。从更广义上说，教育日益成为爱尔兰人“跨文化自觉的代理者”和两国“未来商业关系的促进者”。⁴首先，两国相关高校借助孔子学院的渠道开展项目合作。都柏林大学与北京工业大学2012年合作建立了“北京—都柏林国际学校”，并计划设立烟台都柏林大学。科克大学与合作院校——上海大学开展了深度合作，与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联合办学。其次，两所孔子学院在科克—上海、都柏林—北京友好城市建设中扮演了积极角色。2005年上海和科克市正式建立了两国间的第一对友好城市。科克大学与上海大学合作筹建中国研究院和孔子学

院的工作成为两城市合作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柏林大学的教育合作项目也成为2011年《北京—都柏林友好城市合作协议》的重要内容。

此外，两所孔子学院通过参与所在城市主办的促进多元文化融合的中国春节文化节等活动，承办国内文艺团体在爱演出，安排爱尔兰学生到中国交流，发挥综合性人文交流平台的作用。如2008年以来，都柏林市政府春节庆祝活动中，除当地华人、华侨社团、爱尔兰国家图书馆等文化单位外，两家孔子学院都成为组委会的机构参与单位，并通过举办学术讲座和文化体验活动等方式传播中国文化。正如都柏林市负责少数民族融入事务的官员海登所说，

1 【爱】杰鲁莎·麦科马克著，王展鹏等译：《爱尔兰人与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2 Fan Hong and Jörn-Carsten Gottwald (eds.), *The Irish Asia Strategy and its China Relations*, Amsterdam: Rozenberg Publishers, 2010.

3 Dermot Keogh and Mervyn O'Driscoll, *Irish Multilateral Diplomacy and the China Question at the UN in the 1950s* [C]//The Conference on Sino-Irish Relations, Beijing, 2009.

4 Fan Hong, *Connecting Cultures*[C]//Fan Hong and Jörn-Carsten Gottwald (eds.), *The Irish Asia Strategy and its China Relations*, Amsterdam: Rozenberg Publishers, 2010.

孔子学院不应是一个封闭的体系，除做好汉语教学和中国研究外，还可以扮演更加开放、多元的中国文化中心的角色。这样，既可以向爱尔兰人传授中国的商业文化、合同法等实用知识，也可介绍中国的电影艺术、饮食文化等更为鲜活的内容。¹

三、理论意义与实践启示

综上所述，像爱尔兰等在历史上中外人文交流相对滞后的国家，孔子学院具有推进人文交流深入发展的更为广阔空间和巨大潜力，借助孔子学院，爱尔兰人有机会了解真实的中国，孔子学院在事实上起到了向对方“公众表达本国国情……提升本国的形象”的功效，²从而可以避免陷入简单化思维和文化误读的误区，发挥“人文交流比政治交流更久远，比经贸交流更深刻”的优势，充分体现其“基础性、先导性和广泛性”的特点，给双边关系的整体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爱尔兰两所孔子学院在中国研究机构发展、中国学学科身份建构、研究内容拓展和范式创新方面发挥的作用，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国家软实力建设等领域的理论建构提供了重要经验事实；对认识孔子学院促进中国学发展和人民间的理解与交流的重要意义具有多方面的启示；也为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提供

爱尔兰两所孔子学院在中国研究机构发展、中国学学科身份建构、研究内容拓展和范式创新方面发挥的作用，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国家软实力建设等领域的理论建构提供了重要经验事实。

了启示与借鉴。

对于中国学基础相对薄弱的中小国家而言，在中国崛起和中外关系全方位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出现了进一步借助专门的知识生产和创造加深对中国了解的现实需求。孔子学院的建立正当其时，共同推进了这一进程。爱尔兰孔子学院积极参与这一进程，在完成汉语教学、文化推广等基本职能的同时，实现了与爱尔兰刚刚起步的中国问题教学、研究机构的深度融合。

在此过程中，爱尔兰中国研究表现出从爱尔兰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代发展的现实出发，积极思考爱尔兰中国研究，既不同于英美等西方大国，也不同于发展中国家的特色。爱尔兰历史和文化经历的复杂性包含了世界与民族、现代与传统、全球化与民族独立、国家建构等多重命题，在看待中国时既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又有基于自身经历的独特视角。随着孔子学院

中国研究领域的拓展，这一取向日益突出。同时也应看到，爱尔兰传统汉学起步晚，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中，偏重中爱商业文化交流的研究较多，文学文化方面的教学研究还相对不足。应在孔子学院和现有研究机构中加大相关教学和研究力度，同时也需要我们在对外宣传、文化推广中通过切实可行的政策、策略做好导向、引导工作，进一步夯实双方人文交流的基础。

两所孔子学院与所依托的高等学校、当地社会联系紧密，本土化程度高，充分融入所在国高校教学科研活动，与爱尔兰社会增进双方了解、加强人文交流的愿望和需求相契合，从而超越了汉语教学和狭义的中国文化传播的职能，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民与人民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深度交流的功能：在爱尔兰中国学发展、中爱学术交流和合作办学、增进爱尔兰社会和华人华侨间的联系并利用专业知识支持海外侨胞积极开展交流活动、推进中爱友好城市间文化关系的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扮演了中爱人文交流使者的角色。从这种意义上说，孔子学院具有成为我国包容开放的对外文化交流广阔平台的潜力，随着其资源的不断丰富，其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促进中外人文交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中的作用将进一步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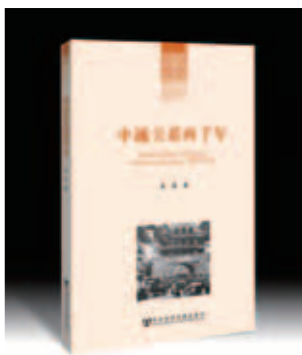
1 2013年10月22日，海登(Declan Hayden)先生访问北外期间所做的访谈。

2 赵启正：《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亚洲研究丛书·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系列”4部著作出版发行

“亚洲研究丛书·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系列”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推出的亚洲研究学术著作系列丛书，是中心每年学术著作资助出版项目成果的有效整合和集中展示。希望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与发展，“亚洲研究丛书·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系列”能够形成规模性系列丛书，以期为亚洲研究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的读者朋友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为弘扬亚洲文化、繁荣亚洲学术研究做出贡献。

该系列丛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截至目前，丛书系列已有4部著作《中越关系两千年》、《东亚文明论》、《中国亚非关系史》和《缅甸历史、文化与外交》出版发行。



书 名：《中越关系两千年》

作 者：文 庄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

出 版 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6月

《中越关系两千年》

中国和越南两个民族、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着历史悠久的传统亲密关系。那么，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呢？

在我国，《二十四史》和历代多种古书中，记载着大量有关中越关系的生动史实。这本小书是把它们加以梳理，并参考越南史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按中国历代的沿革串联起来，

以史话的形式讲述两千年来的中越关系。这是前半段。

后半段讲述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法国和美国先后武装侵略越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立即向越南提供长期的全面支援，支持越南民族解放战争，越南于1975年实现了国家统一。在这30年的历史巨变过程

中，充满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留下了大量感人的史章，需要去记载、去弘扬。这里只能以割爱的心情去繁就简，集中于若干焦点和核心人物与事件，以期以史为鉴，走向未来。

通过数千年中、越两个民族关系

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这两个友邻民族之间的互相作用和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但作为中原主导民族的华族对作为南疆一个重要民族的越族，影响是全面的；而越族对华族的影响则是局部的。两个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是

它内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实际情况在相互关系上的反映。对中国历代的沿革，我国读者比较熟悉。本书主要谈到若干越南历史事件，并提供粗略参考。

《东亚文明论》

本书将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四国视为一个共同体，称之为“汉文文明圈”。作者对于共同宗教佛教和儒教与文学的关系、民族语言与通用书面语汉文之间关系的变化、文学创作阶层与文学体裁的交替等几方面的内容，采用多重视角，从宏观到微观，详尽地考察了这四个国家之间彼此相互作用的过程。

作者通过对中世纪时期各国之间



书 名：《东亚文明论》

作 者：赵冬一（韩国首尔大学）

译 者：李丽秋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

出 版 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 年 7 月

良性的文学互动关系的阐述，对东亚的中世纪文明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并主张应该吸取中世纪文明的普遍性与

包容性，实现东亚文学的共同繁荣，迎接新时代的变化。

《中国亚非关系史》

本书全方位、多视角地论述了历史上中国和亚非各国的关系，采取分专题叙述的方式，包括古代中国人的亚非知识，丝绸之路，佛教、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中国和亚非各国的交通和贸易，汉文化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影响，资本主义化与殖民化下的中国亚非关系，华侨、华人在中国和亚非国家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走向世界及其对亚非的认识等。



书 名：《中国亚非关系史》

作 者：耿引曾（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客座教授）

出 版 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 年 1 月



书 名：《缅甸历史、文化与外交》
作 者：许清章（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
出 版 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 年 5 月

《缅甸历史、文化与外交》

缅甸是中南半岛大国之一，资源丰富，它长期执行中立和平外交政策。1948 年缅甸独立后吴努执政，国内因长期内战，1962 年军政府执政。

经过几个朝代的军人执政，仍未摆脱落后保守状态，忽而推行“国有化政策”，忽而又搞“社会主义建设”，依旧未能摆脱贫困境地，依旧执行闭关锁国。近期，随着闭关锁国的缅甸军政权的移交，缅甸国门逐渐打开，世界也把目光集中到了这个资源丰富、亟待开发的国度。因而，了解缅甸、认识缅甸也成为当前中国广大民众的需求。中国缅甸学界（包括师生）也迫切需要了解当前缅甸的情况。

蒲甘王朝是缅甸最早建立的王朝，缅甸人称为缅甸的盛世。蒲甘时期，缅甸国力强大，生产力水平也高，最后由于蒙古人的入侵而消亡。

缅甸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时常因为相互争夺领土而发动战

争，结果由于战争而耗尽国力、人力，生产力也得不到提高，由此，一个原本物产丰富、土地肥沃的国家变得国力衰败、民不聊生。

1829 年，即巴基道执政时期，缅甸这个佛教之国，做出了一件惊人之举，出版了三卷本的历史巨著《琉璃官史》，这部三卷本的历史巨著由 20 多名高僧及宫廷学者经 20 多年的努力而完成。现中国已经正式将其翻译出版，这是震惊世人之举，其不足之处是书中参考中国版本的图书为数尚少。

缅甸是一个文化丰富、历史悠久的国家。缅甸文化学者德班索因在其所著的《论缅甸文化史》一书中称，“任何一个国家社会之组成和存在，如果离开人与人之间的存在，如果离开了古代习俗、清规戒律和伦理道德的存在，那是不可想象的。”他认为，缅甸的文化及伦理习俗大多来自印度的宗教，先是婆罗门教后是上座部佛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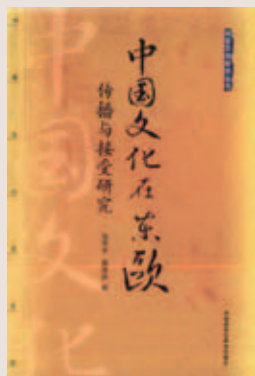
影响，上座部佛教一步步渗入缅甸社会各阶层。然而，佛教和婆罗门教相较而言，佛教更受缅甸人民的欢迎。

中缅两国，山水相连，相互毗邻，自古以来，联系密切。再加上，两国时有战事发生，相互增加了一些接触的机会。

本书还对缅甸外交政策方面的演变进行了总结。几篇文章先谈十多年来缅甸外交政策的演变，接着回顾中缅两国友好交往的发展，简析思考未来几十年的外交前景，展望未来中缅两国外交的发展蓝图，最后介绍周恩来总理率领 400 余人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浩浩荡荡访缅，震惊了中缅两国乃至全球，为中缅两国友好外交写下了美好的一笔。两国终于签订了《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为中国与其他国家边界问题的解决做出了良好的榜样。

附加的几篇论文中，有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错综反复、栩栩如生且有哲理性。有对某一国家国情（缅甸）的专题研究分析，还有针对人才培养及实践感受的文章，既有个人所见所闻、亲身实践，加以综合提高，又有观点和总结。《世界上最大的一本书》讲的是缅甸一国研究最深入、信仰最虔诚的三藏经，其经书全文正是镌刻在石碑上，人们称其为世界上最大的一本书，也称古道陀三藏经，以此文结尾正符合缅甸为“佛国”之称。

《中国文化在东欧：传播与接受研究》



书 名：《中国文化在东欧：传播与接受研究》

主 编：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
汉学研究中心）

郝清新（匈牙利罗兰大学孔子学院
外方院长）

出 版 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 年 8 月

本书系 2009 年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和匈牙利汉学界在布达佩斯共同主办的“东欧汉学国际研讨会”的论文结集，另采选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刊物《欧洲语言文化研究》登载的若干论文，归属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近年合作出版计划中的“国际汉学研究丛书”系列。

全书分设“东欧与中国：文学、语言学交流”、“传教士汉学研究”、“中国哲学、历史、宗教研究”、“中国文学研究”、“中国文化、戏曲研究”、“国别汉学纪年与汉学机构”六个专题，收录了宋炳辉“东欧的意义和东欧文学在现代中国的影响”，叶隽“东欧文化的融入意识及其现代性品格——以卡夫卡等现代奥国精英的思想形成及其中国接受为中心”，林温霜“传自黑

海的呼号——保加利亚文学在中国的接受”，波丽娜·东切娃“18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初中国小说在保加利亚的接受”，Huba Bartos “Chinese Linguistic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its Contributions to Modern Linguistic Theory”，Jana Benická “Classical Chinese—Why Should It Be Part of Curricula?”，张西平“波兰汉学的奠基人：卜弥格”，张振辉“卜弥格著作的文学特色”，约瑟夫·弗沃达尔斯基“波兰人意识中的中华帝国”，伊丽亚娜·霍加—韦利什库“孔子进入罗马尼亚文三百年考述”，李雪涛“作为德国汉学家的白乐日”，Györgyi Fajcsák “In the Footsteps of the Buddha—Some Remarks on Collecting Buddhist Sculpture in Hungary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龚坤余“中国文学在匈牙利”，冯志臣

“《道德经》与埃米内斯库的诗歌理念”，马立安·高利克译“尤里乌斯·泽耶尔——向捷克介绍中国文学的第一位作家”，马丁·斯洛博德尼克“‘这里一切都是土生土长的，都明显是中国的’——约瑟夫·泽齐伯爵中国之行的日记（1876）”，Gergely Salát “Chinese Literature in Hungary: A Historical Overview of Translations”，Luminita Balan “The Transfer of Concepts in Translating the Chinese Classics”，舒乙“普实克——了不起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家”，陈平原“三读普实克——在纪念捷克汉学家普实克诞辰 100 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发言”，杨学新“普实克先生百年华诞”，李梅“捷克汉学家普实克的弟子与《红楼梦》的捷文翻译”，玛丽娜·恰尔诺古尔斯卡“《红楼梦》：一部奇妙的文学密电码——曹家真实命运与小说中贾家虚构命运之间的有趣对应”，郭晓晶“中国文化在匈牙利的传播”，Ágota Revesz “Those Beautiful Misperceptions—Reflections on Beijing Opera by Central European Theatremakers”，玛丽娜·恰尔诺古尔斯卡“斯洛伐克汉学研究五十年”，Imre Hamar “The Transmission of Sinology in Hungary: The Past and Recent Developments”，Irena Kalużyńska “The Sinology Department of the 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Warsaw – Past and Present”等重要论文近 30 篇，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东欧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主编 郭棲庆 赵宗锋

编辑 王惠英

设计 大达期刊设计公司

E-mail: icwar@bfsu.edu.cn

电话: 86-10-88813845

传真: 86-10-88813842

地址: 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100089